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助

严复译介穆勒逻辑思想研究

YANFU YIJI E MULE LUOJI SIXIANG YANJIU

宁莉娜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资助

(项目批准号: 11YJA72040002)

严复译介穆勒逻辑思想研究

YANFU YIJIIE MULE LUOJI SIXIANG YANJIU

宁莉娜 著

常州大学
藏书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复译介穆勒逻辑思想研究/宁莉娜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671-2477-6

I. ①严… II. ①宁… III. ①穆勒(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逻辑学-研究 IV. ①B561.42②B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5949 号

责任编辑 焦贵萍 杨颖昇

封面设计 缪炎栩

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

严复译介穆勒逻辑思想研究

宁莉娜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56 千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2477-6/B·088 定价: 48.00 元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也译为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19 世纪英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及社会改革家, 古典归纳逻辑的集大成者, 严复将其《逻辑体系: 演绎和归纳》(*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一书的主要内容译著为《穆勒名学》, 于 1905 年由金陵金粟斋木刻出版, 由此穆勒逻辑思想传入中国, 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革新及逻辑观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源, 并产生深远影响, 严复所用的穆勒译名被沿用至今。穆勒的这部名著作(简称《逻辑体系》)从 1830 年开始构思, 分为三个阶段写作, 直至 1843 年出版, 所呈现的思想体系被德国逻辑学家亨利希·肖尔兹称之为“影响到全世界”^①的逻辑, 这部西方逻辑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在穆勒生前就曾出版 8 次, 受到世人瞩目。

严复(1854—1921, 福建侯官人, 字又陵, 又字几道)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先驱, 身处中国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时期, 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重创后, 中国已经处于“积弱不振”、“深耻大辱”^②的危难之中, 严复肩负时代使命, 试图以呼唤国人精神觉醒的方式复兴民族大业。穆勒逻辑思想所“关心的是提高人的精神”^③, 这种鲜明的精神文化特质引起严复的极大关切, 他将穆勒逻辑引入国人视野, 旨在通过科学方法实现思维方式变革, 进而挺立民族精神, 重塑民族文化。基于民族复兴离不开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离不开精神挺立这一认识, 以及对随西学东渐而发生的中西文化碰撞的思考, 严复以文化救国为突破口, 引介并传播穆勒逻辑思想中的科学方法, 从融合科学方法与

① 亨利希·肖尔兹著, 张家龙译. 简明逻辑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7. 20.

② 王栻主编. 严复集, 第一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7.

③ [英] 约翰·穆勒著, 吴良健、吴衡康译. 约翰·穆勒自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序言 5.

人文精神的逻辑观念这一深层文化要素入手,将逻辑精神注入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之中,使逻辑从思想的工具内化为人的文化观念,拓宽近代文化革新路径,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反思与重建提供有效方法,为救亡图存、自强保种寻求良方,以挽救文化危机,进而拯救民族危亡。

一、穆勒逻辑思想的精神文化内涵

穆勒生活的时代是英国社会的转型期,面对英国工业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但人们的精神文化存在感却开始缺失的现状,穆勒从思想活动的分析入手,确立解决精神危机的前提问题。他发现有效的思想方法与摆脱精神危机之间具有密切的因果关系,为此,他重视从思想方法上研究道德、信念等人类社会生活根本问题的辨谬与论证方式,使思想能够生产更多的优质精神产品,以摆脱精神危机。为此,他打开了逻辑研究通向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的道路,即以超越逻辑传统的方式,将思想的活力注入其逻辑体系中,将逻辑的思想价值引入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中,体现其逻辑所特有的思想文化内涵:为摆脱精神危机寻求思想方法基础;为清晰论证思想提供有效方法;为突破思想的有限性拓宽逻辑进路。实现由逻辑方法向逻辑精神的转化、由逻辑精神向精神文化的转化,为当代逻辑的发展走向开显出思想路径,也为社会转型期激发思想活力提供借鉴。使富有思想关怀的逻辑融入人的自我意识及社会发展中,用以涵养人的理性自觉,提升社会生活的精神品质。

(一) 为思想方法提供逻辑基础

穆勒逻辑学说诞生于英国工业革命完成时期,在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穆勒注意到,虽然经济快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但人们的精神文化存在感却出现缺失,信念淡薄、智力麻木,表现出行为习惯的日趋卑贱、高尚情操的日渐缺乏,甚至以嘲弄的态度贬低高尚行为等,这种精神危机给穆勒本人也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作为社会改革的倡导者,穆勒在对英国社会发展问题进行思考、寻求解决路径时,注意到精神危机的严重性和文化重建的迫切性,并发现有效的思想方法与摆脱精神危机之间具有密切的因果关系,他试图将逻辑方法作为思想方法的基础,从思想方法的分析入手,确立解

决精神危机的前提问题。在穆勒看来,英国出现的这场精神危机,表现为工业产品丰富与精神产品匮乏之间的矛盾,即精神文化滞后,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社会转型期人们在思想上出现批判和否定意识的必然反映,也是人们失去旧有的信念但又尚未建立起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的新信念的必然结果。穆勒重视从思想方法上研究道德、信念等人类社会生活根本问题的辩谬与论证方式,使思想能够生产更多的优质精神产品,激发文化的凝聚力,充分发挥精神文化建设在摆脱精神危机中的作用。为此,他强调通过对个体思想方法的培养与完善,以理性的方式确立信念,并使其成为社会理想融入人们的普遍情操中,让思想的自由更具有科学性,进而引领公共生活获得精神力量,促进个体与社会共同进步。他称自己的这些思考是“思想方法明确进步的转折点”。^① 面对情绪沮丧、精神麻木、道德沦丧、信心微弱的社会现实,穆勒主张将逻辑作为思想方法的基础,发挥逻辑在精神文化重建中的理性选择与整合作用,推进社会发展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

《逻辑体系》内蕴强烈的科学精神与反思意识,穆勒自称是当时迫切需要的理论。穆勒研究逻辑学,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一门知识,而是与他英国社会未来发展命运的思考密切关联。他将逻辑所特有的科学方法运用于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体现了对人的自由、幸福和责任等问题的现实关注。穆勒十分重视“自由”和“责任”的基本要义,并以逻辑的方式为其辩护,倡导在批判反思中,建构具有普遍性、权威性的新信念。正是基于此,他认为,幸福感的获得是与对利益的尊重相关的,要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就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要他们相信事实证据,懂得什么是他们的真正利益,一旦他们懂得真正利益所在,我们认为,他们必定会通过交流思想的工具,尊重彼此的利益。”^② 显然,穆勒将利益受到尊重作为获得幸福感的前提,而利益受到尊重又是建立在事实进行逻辑论证的基础上,逻辑为思想的有效交流提供科学方法。

身处社会变革时期的穆勒,为英国社会改革探寻思想方法的逻辑基础。在摆脱精神危机困扰的过程中,穆勒将变革社会作为生活目标,并视此目标为自己的幸福所在,由此焕发出思想的热情,形成了思想的新方法,即关注逻辑

① [英] 约翰·穆勒著,吴良健、吴衡康译. 约翰·穆勒自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7. 101.

② [英] 约翰·穆勒著,吴良健、吴衡康译. 约翰·穆勒自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7. 69.

在意见表达、思想交流中的论证与辨谬作用,在此基础上他开始了逻辑理论的研究,这也决定了他的逻辑思想与其政治、经济、文化等观念的密切关系,进而表现出穆勒思想中逻辑与哲学、政治和经济所具有的深切关注人类自由与幸福的一致性。在《逻辑体系》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中,集中反映了穆勒对亚里士多德传统逻辑和培根归纳逻辑的超越意识,在希腊理性主义精神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基础上对逻辑的科学精神与人文价值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一次深刻反思。穆勒的逻辑思想究竟与前人有着怎样不同的价值取向?由于他早年就开始接触《工具论》,可以说他深谙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理论,同时,他又继承了英国经验哲学传统及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论》所构设的归纳逻辑方法,因此,他在反思逻辑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逻辑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重点呈现的是三段论这种演绎推理及其规则,而有关“词项”及“归纳”等问题没有得到详细研究;培根在批判亚里士多德演绎逻辑的基础上,将建立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归纳法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他从经验和理性两个方面结合的角度探究科学归纳法,反对忽视理性的经验。他还注意到了语言对理解力的影响,但未对语言问题系统分析。而是霍布斯等人的理想语言启发了穆勒从逻辑视角进行研究。他在与人讨论问题时,注意将名辞间的区别和命题的意义等逻辑思想记录下来,试图从理论上弄清逻辑问题,他将演绎推理视为推理,而在讨论归纳问题时,将其作为一种方法。在他看来,进行演绎推理时,必须先弄清前提,而归纳法主要是从结果找出原因的方法。可以通过个别事物的得出一般性结论,这种前提是无法通过三段论这种演绎推理本身来获得的,需要通过实验找出原因用以分析。穆勒发现用最具体的实例研究抽象的原理是有效的,他还设想将其发现的力学中“力的合成”用于研究思想应用过程中“力的合成”原理时,能给思想带来哪些变化。他认为,对于演绎法的使用,要恰当地选择,将自然哲学的演绎法与纯几何演绎法要区分开,这也成为他《逻辑体系》最后一卷《精神科学的逻辑学》的基础,至此,他的逻辑思想与其政治信念相关的新见解更加明确了。严复正是看到了穆勒逻辑的思想特质,将其引入中国近现代文化重建中。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关注戊戌维新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引进传播西学的现象时,鲜有反向沉思逻辑方法的作用。事实上,20世纪初西方逻辑方法在严复的引介与传播下,为辛亥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作了必要的思想方法的铺

垫。对这一历史阶段进行文化反思,不仅为研究近现代文化思潮所必需,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反思逻辑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期的作用,追溯中国近现代逻辑观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逻辑的工具价值和所发挥的科学方法的工具作用,同时,也印证了严复借穆勒逻辑来进行文化自救所采取的治贫先治愚的策略是必要的。

(二) 为清晰论证思想提供有效方法

穆勒强调人的思想只有通过充分论证、清晰表达才能有效交流,进而使公众利益在受到尊重的前提下得以实现,他指出:“一般观念中这种清晰性的缺失或者像另一种称呼所称的含糊性,可能或者是由于我们对对象本身没有准确的认识”,^①即在穆勒看来,表达的不清晰,是思想本身不清晰的结果。《逻辑体系》融入了英国实验科学的思想成果及对社会发展的现实关切,它的问世是穆勒为英国精神文化重建寻求有效思想方法的大胆探索,也是穆勒将说理求真的逻辑方法引入思想任务中的有效尝试,穆勒以逻辑这种特殊的方式关注思想的有效性。在他那里,逻辑有着两个相辅相成的维度:一是关于逻辑的科学,它涉及一般的思想,是我们进行实际推理的方法;二是关于逻辑的技术,这是有关特定思想的有效性,根据规则要求进行正确推理。^②穆勒将逻辑作为科学方法的科学,运用于人们的思想活动中,开辟了逻辑方法以保证思想表达清晰、有效为目的研究路向。在《逻辑体系》中,充分体现出逻辑分析及其法则与实证经验的密切联系,并为探求推论的科学原因提供依据,这也反映了穆勒将逻辑的科学性作为思想方法基础的要求所在。而作为技艺,逻辑则为思想的清晰性服务,包括由思想的最小单位“名称”的清晰性,到命题的构造与论证的充分性。正如穆勒所言:逻辑通过“制定规则或准则,用于检验论据对论题的证明”,^③在穆勒看来,公共生活涉及公众的利益诉求,尤其需要思想表达的有效性,即借助逻辑使思想表达更为澄明,包括意见表达的清晰性、说理的充

① J. S. Mill.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M].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4. p. 658.

② James, P. Zappen. *The Logic and Rhetoric of John Stuart Mill Philosophy & Rhetoric*, Vol. 26, No. 3. 1993, pp. 191 - 200.

③ J. S. Mill.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M].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4. p. 12.

分性和思想论证的严谨性,将逻辑的内在精神通过公共话语的交流得以体现。穆勒的这种逻辑观,得到了殷海光先生的高度评价,他十分赞赏穆勒所强调的对任何道理都要进行辩论的主张,以及穆勒视言论自由为“增进人类心灵上的福祉。而人类心灵上的福祉是人类其他一切福祉之所本”,^①在殷海光看来,这里所谓的言论自由,是一种语言行为的内在自由,即当语言在说理论证等思想表达中,能自觉遵守逻辑的规律规则,就是在言论上获得了一种自由。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创立逻辑学说体系,就重视有效推理、充分论证的规则,以合乎逻辑的说理方法来表达意见、交流思想,陈述对生活的见解,使逻辑所具有的理性规约成为社会生活中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涵养人们的公共意识,让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在相互关联的状态下获得存在的意义,通过逻辑的思想力量,呈现人类追求幸福的美好理想,让公民在实现公共生活目标的过程中,有思想方法的遵循,得到应有的尊重。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孕育于古希腊的哲学、文化、数学及其实践领域,在对宇宙万物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中,人们关注到思想之间存在着必然性联系;进行思想交锋时,需要掌握论辩技巧,人们注意到说理论证方法的重要性;运用数学方法可将一系列证明有规律地排列起来,人们体察到求知活动中的规则意识。也正是在思维实践的迫切需要下,逻辑学说被亚里士多德创立。穆勒将前人逻辑思想中所具有的演绎、归纳等论证方法进行了比较、互补与完善,并对归纳法的或然性结论进行分析,揭示其前提与结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使其成为增强思想有效性的逻辑方法。

西方逻辑脱胎于哲学的怀抱,哲学是逻辑的母体,孕育了古希腊逻辑的诞生。先贤们在追问宇宙、追问神、追问人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清晰、严谨的论证方式表达思想,以达到令人信服的效果,进而呈现出人类思维表达所具有的公共准则和普遍规律,源于希腊语中“思想”、“理性”、“语词”、“规律”等涵义的逻辑就应运而生,所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虽不以技术见长,但它揭示了人类思想交流过程中有效论证的方法,将人类的逻辑智慧凝练为一种可以在实践活动中解决思维问题的系统学说,从而无人能撼动他作为西方逻辑之父的地位。穆勒继承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这种价值指向,将逻辑思

① 殷海光著,思想与方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54.

想与英国政治历史与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相契合,对英国的社会观念变革和思维方式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同人们对他的《自传》虽抱怨其没有传记文学特点但又不能不将其视为19世纪知识分子历史中头等重要的文献,所表达的为公众利益献身的精神是英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①如果说柏拉图将理想社会作为一种崇高生活的话,那么穆勒则希望对于这个美好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以理性的方式去追求幸福。在穆勒看来,人的尊严与理性密切相关,以理性的力量震撼精神世界,以生命的存在方式为基础,以自由和幸福为目标。他的逻辑思想最关心的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种关心导致他用冷静的头脑讨论经济问题和检验他的逻辑基础”。^②在19世纪英国社会转型期,“对于变革,除了达尔文外,他比任何其他思想家发挥了更大的影响。”^③穆勒重视研究归纳法是为演绎推理寻找前提,他对演绎推理的前提要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在他看来,归纳法主要是从结果找出原因的方法。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学体系是建立在古希腊几何学的基础上,那么,穆勒的逻辑思想则反映了西方近代实验科学所取得的新成果,二者都内蕴了时代所赋予的科学精神。如果分析穆勒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之间的有别之处的话,不难发现,穆勒逻辑更重视逻辑论证在人类追求自由活动中的作用,他在《论自由》中曾指出:“个人的自由必须约制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但是如果他戒免了在涉及他人的事情上有碍于他人,而仅仅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上依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断而行动,那么,凡是足以说明意见应有自由的理由,也同样足以证明他应当得到允许在其自己的牺牲之下将其意见付诸实践而不遭到妨害。”^④

逻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以其特有的存在方式承载着科学方法与人文智慧的双重价值,并在二者的融合、贯通中关注人类生活目标。

从逻辑方法在思维活动中的作用看,它具有工具性。在思想空前活跃、自

① [英] 约翰·穆勒著,吴良健、吴衡康译. 约翰·穆勒自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序言 1.

② [英] 约翰·穆勒著,吴良健、吴衡康译. 约翰·穆勒自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序言 5.

③ [英] 约翰·穆勒著,吴良健、吴衡康译. 约翰·穆勒自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序言 5.

④ [英] 约翰·密尔著,许宝骙译.《论自由》[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66.

由争辩之风盛行的古希腊,人们思考、讨论的对象由自然界转向人自身,这导致思维工具发生变革,激发了逻辑作为推理、论证工具的形成,逻辑成为人们获取知识、认识真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由于古希腊语言文化的传统、数理几何学的创立和应用,以及古希腊崇尚知识的科学精神,使得形成和运用抽象方法获取知识成为可能,也使得西方逻辑从一开始就具有古希腊几何学的演绎性质和特点,为有效推理、论证所用。近代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在反思亚里士多德逻辑思想的基础上,尝试将人类思想符号化,用机器演算的方法去理解人类思想的构成,将推理的作用从人类的思维活动延伸至机器上,极大地拓展了逻辑的工具作用范围。

同时,从逻辑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目标看,它具有指向性。在苏格拉底看来,人是宇宙的中心,理性是人的中心,他相信理性的追寻和省察能够帮助人类生活得更好、更幸福,人所有的信念都要有逻辑推论,只有借助逻辑的力量才能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相信的一切。柏拉图沿袭了苏格拉底的理性育人的思想,力图根据理性的准则来安排人们的政治生活,以建立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作为西方逻辑创始人的亚里士多德,更是将幸福作为人类生活的目的,其幸福观有着逻辑智慧的色彩。亚里士多德分析了人类的生物学结构及其与人的活动之间的关联,指出人类因为具有推理的能力,才能兴旺发达,相反,如果人类发现自身处于不能推理的处境中,其生活就不会幸福。亚里士多德眼中的推理能力,可以通过训练习得,为追求美好生活提供有用知识,进而成为通向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

与亚里士多德强调智慧的生活才幸福、理智的生命是最高幸福目标不谋而合,19世纪英国逻辑学家穆勒,将逻辑的证明功能拓展为澄明思想的方法,对人类追求全面自由与幸福的逻辑手段进行了深入思考。正因穆勒将人的自由与幸福作为逻辑价值的终极目标,在近代中国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民族危亡时刻,严复将穆勒逻辑引进并传播,对近代中国文化革新及社会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为突破思想的有限性寻求逻辑进路

穆勒逻辑思想具有科学方法与人文精神相融通的鲜明特征,他在构建逻辑体系的过程中,在对传统逻辑方法反思的基础上,从解决人们心智活动的有

效方法入手,解决逻辑的技术性问题,进而探究知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将逻辑作为人类智识活动的科学来研究。同时,穆勒还关注逻辑在公共政策中的运用,为了实现逻辑方法运用于公共政策,他强调逻辑方法作为保障每个成员经济与政治权益、人身与精神自由的必要条件。“引言”中穆勒讨论了逻辑的内涵及其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和目的,将逻辑作为推理的艺术和科学、追求真理的方式。第一卷“名称与命题”,穆勒将逻辑界定为一种证明的方法,继而研究谓项的特性及其所指。第二卷“推理”,穆勒分析了以传统三段论为代表的演绎推论,讨论了知识领域里的逻辑地位。第三卷“归纳”,讨论了归纳探究开始于对事物要素的分析,探究了原因、效果、结果之间的关系,系统论述了探寻因果关系的归纳方法。第四卷“归纳的辅助方法”,讨论用哲学的语言准确的观察、记录和交流,进行归纳实践。第五卷“谬误”,讨论了用于假设、论证、谬误等检验的逻辑。第六卷“精神科学的逻辑”,指出人性受制于由逻辑揭示的可促进幸福的科学原理。穆勒对名辞之间的区别和命题意义的研究,就为了进一步弄清逻辑理论对人们认识活动中表现出的思想局限性的解决方式。

与当时的直觉哲学学派不同,穆勒以经验联想及归纳推理的方式,直面人心所向的社会问题,采取对既成事实的看似必要性和不可改变性提出疑问的思想范式来推进社会改革。在这个过程中,穆勒试图借助已有的经验,通过逻辑的推演而非心理学意义上的联想,进行理性的审查,以打开思想的疆界,主张将逻辑精神引领下的内在自我的培养与发展,作为个体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他曾说,自己“思想上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我第一次把个人的内心修养当作人类幸福的首要的条件之一。”^①他《逻辑体系》中《精神科学的逻辑学》的主要几章就是在他研究归纳法时打下的思想基础,并体现出与他以往政治信念有关的一些新见解。在他看来,既要解决逻辑前提问题的论证,也要将论证方法运用于人的自身发展与社会关系的推论中。穆勒对逻辑论证的推崇,源自他眼中的逻辑自身问题的解决也需依赖论证的方式。如果说他对亚里士多德逻辑持审视态度的话,那么他将重点放在对演绎推理前提何以成立的追问,他不停留在预设的前提面前,而是对前提的合逻辑性进行论证,显然,他用逻辑的方法突破已有前提的束缚,以寻根问底的方式求真。在他看来,要

① [英] 约翰·穆勒著,吴良健、吴衡康译. 约翰·穆勒自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7. 88.

依据前提进行推理,就首先要通过论证来获取前提,归纳法有助于从结果找出原因,可通过个别事物导致一般化结论,追溯其存在的原因。被他称为“试验”而不是经验、实验的归纳逻辑论证方法,包含着英国实验科学方法与穆勒对社会与人的发展的人文关怀。正因如此,穆勒的归纳论证重视对经验的概括,但不是简单的得出结论,而是在已有经验与推出结论之间找出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他的“试验”归纳论证方法以超越现存经验的方式,对未知事实进行具有一般意义的推断,进而具有打开思想禁锢的作用。

穆勒基于因果关系的概念来定义不同类型的归纳,体现归纳的目的是为了找寻导致结果的原因。他继承经验主义传统但不摒弃演绎逻辑,且有对归纳法的严谨而系统的解释以及对演绎与归纳关系的深刻理解。穆勒将其逻辑用于反驳以直觉、先验的方式获得认识的观念,强调任何知识都来自经验,不能逃避理性的审查,否则所获得的认识都只能是偏见。在穆勒看来,他的《逻辑体系》能取得巨大成功,是其引发了对思辨自由的重视,为英国社会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突破思想局限性的知识支持。穆勒在对归纳法的研究过程中,注意到合理地使用概念,并力图将归纳法整理为严密的法则和科学试验的模式,使其具有三段论推理的特点,既不是运用一般的推理得出结论,也不是使用特殊的经验来推出结论,“而是以特殊经验来校核以得出一般性结论,然后断定此结论是否符合已知的一般原理,并加以证实”,^①这种在演绎与归纳之间进行融合的尝试,表明穆勒对演绎方法的严谨性的重视,同时又将归纳所得出的或然性结论进行原因分析,使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不断增强可能性,以推论的方式突破思想的局限性、实现可预期性,这正是他研究归纳法的独到之处,也是他唤醒人们摆脱僵化思想的诉求。穆勒在对传统逻辑方法展开反思的同时,扩充了传统逻辑的归纳方法。穆勒逻辑所具有的语言分析基础,成为罗素经验主义分析及逻辑证明的思想资源,也是严复在译介穆勒逻辑时所强调的。

为了使逻辑在突破思想有限性方面发挥作用,穆勒曾指出:“既然普遍名称以不用让心灵想到其全部意义并且常常只让心灵想到很少的或者根本想不到任何意义这种方式被使用(即使只是恰当地发挥了其部分作用),所以我们不会觉得奇怪,如此使用的语词在适当的时候出现时不再能够让人想到除了

① [英] 约翰·穆勒著,吴良健、吴衡康译. 约翰·穆勒自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125.

那些与之最直接、最有力地关联起来的或者由生活中的各种事件最直接、最有力地保持下来的观念之外任何别的专属于它们的观念,而除非心灵常常通过有意识地思索它们来保持与它们的关联否则这些别的观念将会彻底消失。”^①他如此重视逻辑方法对人们心智活动的影响,触及主体认知、信念、信仰等认知逻辑问题,其科学精神贯穿于逻辑体系中。从物质文化的满足向精神文化重构的转型,伴随着熟人社会向非熟人社会的转变,后者更重视在公共生活空间中确立公共生活秩序,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营造公平与正义的社会氛围。在穆勒看来,边沁科学地把幸福原则运用在行为的道德性上,受边沁“最大幸福”的准则影响,穆勒试图根据英国社会复杂多样的现实发展需要,关注人们追求幸福的各种路径及方法,寻求改变人们思想文化观念的有效方式。所以,被称赞为“穆勒提高了与他同时一代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同代人中没有其他人能做到的。”^②穆勒试图构建一个合乎人类自由本性的逻辑体系;融通科学与人文的逻辑;具有社会功能、文化特性、实践价值的逻辑。与穆勒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乃至经济思想相关,《逻辑体系》在探求科学方法、逻辑推论的有效性时,所表现出来的重视人类精神文化的理论,超越经验对思想的束缚,而勇于在演绎和归纳推理的基础上,以有效论证求得未知,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二、严复译介穆勒逻辑的文化关怀

一个民族的文化处境关乎其每个人的处境,也体现其社会的处境,只有通过文化的活力才能带动时代的活力,这是严复引入西方逻辑方法、挺立民族精神、打开文化发展空间的价值所在。从中国近代文化革新的视角来看严复译介穆勒逻辑的意图,显然是他主张思想启蒙先于政治变革的必然结果,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严复尤为关注观念变革与文化革新的关系,高度重视培育、树立近代文化重构的自觉意识,他译介西方逻辑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中国近现代思想界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变革的思考,对

① J. S. Mill.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M].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4. p. 680.

② [英] 约翰·穆勒著,吴良健、吴衡康译. 约翰·穆勒自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8.

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继承逻辑的文化传统

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思想体系,是变迁时期希腊城邦社会生活的产物,又恰与当时思想家们探究宇宙秩序的实证精神和对平等关系幻想的世俗解释相契合。随着当时希腊各城邦之间在生产、生活上的交往日趋频繁,要求政治家具有长于有效论证的辞令,才能在处理内政外交事务中取胜。不仅如此,伴随希腊奴隶主民主城邦制的建立,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权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要经过公民会议讨论通过,普通公民要有在公开场合表达观点的高超技能,才能更好地承担和履行自身的责任与义务。在人们将世界的本原和秩序作为同样重要的问题提出来以后,就要求给出一个与人类理智相称的回答,城邦秩序的特点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逻辑就是因其能提供思维交流的准则,而成为人们参与公共生活、进行演讲论证的有效工具。如韦尔南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一书中所言:“这门随着欧几里得的理论而出现的、涉及抽象对象的科学,从有限的几条公设、公理和定义出发,把严密演绎得出的命题一个接一个地连接起来,用具有形式化特点的验算来保证每个命题的有效性,并在连贯的推理中把这种有效性确定下来”^①,因而古希腊理性精神所孕育的逻辑智慧,具有科学方法的基础,并被运用于政治生活中,成为构建对称、平衡、平等的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新的言说样式的重要路径。经过逻辑的有效推理、论证,将其转换为一种社会文化,使公民相互信任,获得由节制、美德、信任等要素构成的社会和谐的内心理补偿,产生可信的社会效应,进而发挥出政治的真理功能。正像彼得曼所指出的那样:“传统希腊思想对个人成就的定义是过一种高尚而满意的生活。政治成就也在于创造一种满意的市民生活”^②,逻辑论证的有效性即在此得以凸显,因为它存在于说服的修辞艺术中。柏拉图《理想国》中所描述的“理想的城邦”,也生动地展现了理性与言谈的不可分割性,表现出推理、论证在城邦生活的解释、说明、讨论中所具有的逻辑力量,有助于改变人们对已有命题的看法。在苏格拉底看来,

① [法] 让-皮埃尔·韦尔南著,秦海鹰译. 希腊思想的起源[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12.

② [美] 约翰·E. 彼得曼著,胡自信译. 柏拉图[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43.

厌恶理性是人类最大的邪恶,因为没有合理的论证,生活就失去了指南。柏拉图以苏格拉底思想为核心,指出在纯粹的欲望世界里,根本没有任何理性,如果要让我们的个人生活乃至社会生活具有一定意义,就必须陈述对生活的见解,“论证就是澄清我们确实已经认识了这些事物的一些方法;论证能够确定我们的观点,否则它们就要四处游荡,……故事并不能提出具有前提和结论的逻辑证明”^①,只有有效论证,才能正确理解“正义”、“公平”、“善”等概念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与人类理想及幸福相关联的论证,充满着逻辑的力量。

在严复看来,穆勒逻辑对国人具有开启思想文化和科学视野等作用,他试图以逻辑方法将人们引向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以及精神文化的关注,形成具有科学观念的文化自觉。逻辑方法作为文化的构成要素,在文化重建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由其内在的价值诉求决定的,那就是因其与自然科学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同自然科学成果结伴而来,并以科学思维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思想。不仅如此,逻辑又有其人文价值,是人类追求幸福、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理性基础,为人类守护共同的精神家园所必不可少。因此,严复为唤醒国人的逻辑意识、从逻辑的维度建构近代文化作出了不懈努力。

(二) 展现逻辑的人文价值

从严复《穆勒名学》的许多按语也可看出,他很欣赏体现在穆勒逻辑思想中的科学方法,对于逻辑学是什么,它在思想维度中的作用如何,严复认同穆勒的观点。穆勒认为:“逻辑是有关智力活动的科学,是有效的求证活动。这是一个由已知到未知的过程。”^②逻辑学是求真的,用于明是非、辨真伪;逻辑既是科学又是技艺,为人类的思想活动提供工具;逻辑是关于科学方法的科学,具有方法论特征。他指出:“我们绝大部分知识,无论是普遍的真理还是特殊的事实,都是推理的问题,几乎不管是科学,还是人类的行为,都应服从逻辑的权威。推理是生活中的大事,每人时刻都要探知没有直接觉察的事实;不是因为这些事实附加到知识储备中的普遍意义,而是因为这些事实本身对于人们

① [美] 约翰·E. 彼得曼著,胡自信译. 柏拉图[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131.

② J. S. Mill.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M].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4. p. 12.

的利益和工作是重要的。”^①在严复看来,两千余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唯圣、唯经、唯书的思维方式,极大地阻碍了学术、文化乃至理性的发展,而逻辑能为思想的有效性提供帮助,从而可通过逻辑的力量去破除那些文化弊端。他抨击中国之学,动则必求古训,因而人们“所考求而争论者,皆在文字楮素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一切皆资于耳食,但服应于古人之成训,或同时流俗所传言,而未当亲为观察调查,使自得也”^②,进而主张通过归纳方法去除由“惟圣”、“惟古”提供前提的演绎推理,纠正重演绎、轻归纳的传统思维方式,这对打破文化思想上的藩篱,引导人们由“皓首穷经”而面向实际去探索真理,具有重要意义。

穆勒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都源自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关心,将自觉的逻辑意识融入中国近代文化重建之中。严复深知思想观念变革与文化革新的密切关系,努力提升近代文化重构的自觉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顺应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需要。在严复看来,穆勒逻辑对国人具有开启文化和科学视野等作用,他试图以逻辑方法将人们引向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以及精神文化的关注,形成具有科学观念的文化自觉。逻辑方法作为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在文化重建中之所以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由其内在的价值诉求决定的,那就是因其与自然科学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同自然科学成果结伴而来,并以科学思维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思想。不仅如此,逻辑又有其人文价值,是人类追求幸福、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理性基础。严复译介穆勒逻辑,强调文化革新离不开思维方式的转换,而思维方式的深层要素是体现理性精神的逻辑观念,要变革传统的思维方式,就要探寻具有精神文化活力的逻辑思想资源。中国近代是一个求生存、谋变革的时代。伴随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的变化,文化革新成为近代中国的必然选择。要实现文化革新,就离不开思维方式的变革,而思维方式的变革又需要有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正因如此,逻辑方法以其特有的科学方法与思维形态进入到思想家们的视野中。近代文化革新是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碰撞、有识之士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结果,旨在通过文化批判与重建,实现民族复兴及社会转型。

① J. S. Mill.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M].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4. p. 9

②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5.